

黎明或黄昏，城市或乡村，广场上、小区旁、花坛边，总有一群大妈准时出现，她们伴着激情歌曲，动作一致地抬手转身。这群被认为有一块平整空地就能扭动起舞的大妈们，是个将近 1 亿人的群体。喧嚣的争议，将她们与“大嗓门”“奇葩”“落后”捆绑在一起，广场上的她们面目模糊。她们到底是谁？她们为什么如此？她们为何被如此对待？究竟因为什么，广场舞在如此大的群体、如此广阔的范围，活跃地存在并蔓延着？为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湖南师范大学青年学者黄勇军，与同为政治学者的妻子米莉，带领着 16 名学生，对广场舞团体进行了为期 3 年的跟踪调研。湖南、江西、宁夏，城市、乡村、县城，他们接触了 20 多支队伍，1000 多名舞者，与其中 100 名进行了深度访谈。

停不下来的广场舞

孤单无助、无所适从的她们

晚上 7 点半，夜幕拉低了城市的声响，水汽弥漫的长沙城静了下来。

何湘玲走向湖南师范大学江边食堂的空地，大妈们三三两两，已在闲聊等待。她们是调研组成员曹露的观察重点。

音响打开，传出“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的歌曲，何湘玲站在队伍的最前面，膝半曲，手臂上扬，摆出套马的姿势。身后的 4 排大妈跟着何湘玲做出同样的姿势。为了深入观察，90 后曹露也加入团队，跟着一起扭动。

10 多年前，何湘玲所在的长沙某国营单位改制，50 岁的她被买断工龄提前退休。儿子在外地工作，丈夫沉醉于牌局，除了局散回来吃饭，家里很少出现他的身影。做饭、洗衣、拖地，何湘玲不紧不慢地完成一项又一项，因为除了这些，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有时候她会忍不住自言自语：“当时多热闹，一群姐妹吃食堂。”

场地上的大妈越来越多，黄勇军的住宅小区也被帮子女看孩子的老人占据了。这些带孩子的姥姥奶奶们多来自邵阳、株洲、湘潭等周边市县，她们离开丈夫，抛下家乡熟悉的生活，来到长沙，艰难地面对着陌生的高楼格子居、满大街的车辆和长沙话。在家到市场的生活半径里，她们以孙子孙女为中心，重复着一天又一天。

在调研组成员的报告中，城镇退休职工和从农村来城里带孙子孙女的老人们，成为城市广场舞的主体。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让她们成为“最孤单”的母亲，而离开单位退出集体活动的舞台、跟随子女迁往城市，也让曾经熟悉热闹的场景不再，只余孤单无助。

城市里的女人们在广场上扭动着，乡村的打谷场、街道空地上，一批或高或矮略显臃肿的女人也在暮色中舞动。

在江西西北部一个叫溪畔村的小村庄，调研组成员余珊珊生活了近 20 年，直到离家去长沙读大学。

这几年，每当夕阳投下最后一丝光亮，村里原本寂寥的打谷场上就会热闹起来。余珊珊的妈妈、大妈、舅妈、姨妈，随着带杂音的音乐起劲地扭着。站在边上的余珊珊，没觉得扰民，反而觉得这样的热闹有点安慰人心。

对跳广场舞的缘由，青年教授米莉做了这样的描述：曾经聚在一起互相帮助的乡里乡亲，在崇拜财富的市场中成了竞争者；曾经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搬进了对面铁窗紧锁的防盗门；曾经热闹的大家庭，随着儿女工作的搬迁而变得安静异常，令人心慌……

孤单无助、无所适从的她们，在遇到热闹的广场舞后，便一头扎了进去。

在这里她们找到了自己的集体

调研的学生一开始与广场舞大妈交流时，对方会把跳舞的意义描述得极为简单：为了健康和开心。

“等你进入她的生活，看到她跳舞时那种精气神，就会发现不是她们说的那么简单。”曹露说。

何湘玲因舞跳得好，被推为领舞者，这让她找回了年轻时那种被重视的感觉。她教起舞来极为认真，一套新动作，自己先练习二三十遍，厨房做饭、客厅拖地时，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比画。学舞教舞、收取会费、管理账目、运送音响，毫无疑问，她在队伍里不仅是“骨干”，更将自己视为领头人。

领头的大妈们被集体需要着，在江西西北的那个小山村，余珊珊发现跳舞的大妈们好像也找到了集体。如今村子里有什么喜庆的事，她们常常被请去跳一段。甚至村里组织村容建设，参与的也总是跳广场舞的这一群人。她们成群结队，扛着铁锹，提着扫帚，笑着闹着，从村东打扫到村西。

对于多年前就淡出集体活动舞台的她们，在广场上一起舞动，不仅让她们找到了集体，政府日渐关注的举动，更让她们感受到了个人与国家的连接。

几乎所有湖南省洞口县的人，包括从小在这里生活的调研组成员杨卓为，都知道县上“梦之恋”舞蹈队出名了：她们陆续参加了邵阳市、湖南省的比赛，不仅拿了名次，甚至还得到来自文化部的邀请，去北京演出。

在杨卓为的观察中，“梦之恋”的成员中有一大部分是附近煤矿的离退休职工。她们通常选择在煤矿原来的篮球场上跳舞。20 多年前，这里曾有单位组织的篮球比赛，年轻的壮小伙子们每投个篮，都会引来围观人群的一片呼喊。如今，周边厂子有的改制，有的倒了，煤矿也没落了，没人再组织打比赛。昔日的篮球场杂草丛生，门栏白漆脱落，露出铁锈。房地产的热潮在这个小县城兴起，更多的人搬进了高楼上，没人可以说话，曾经吵闹的煤矿大院彻底安静下来。

然而，当音乐响起时，在众人 and 评委、领导关注的眼神中，这些阴沉的忧愁似乎又不见了。她们绷起脚尖，舒展地抬



11月29日，浙江省武义县500多名大妈在滨江广场跳起广场舞。

起腿，踢出一个个漂亮的后旋，脸上的激情不亚于年轻时给投篮小伙子呐喊。

在调研学生观察的这些故事中，广场舞再次给了她们稳定、安全、受关注，也让已近迟暮的她们再次感受到曾经有过的激情、梦想与追求。清晨或傍晚，她们在一起舞蹈，在音乐结束后闲聊，生活变得熟悉起来，无所适从得以消解，在这里她们找到了自己的集体。

“文明”是由谁定义的？

其实，在黄勇军和米莉还在北京读书的 2000 年，学校附近的广场上到处是跳舞的大妈。彼时，低成本的广场舞刚刚开始成为中国妈妈们的锻炼方式。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公民健康议题的重要性被高调提出，广场舞大妈充满活力的健身行为，正好契合国家的发展战略，越来越多的大妈们在广场上、公园里、小区旁扭动起舞。

饶有意味的是，早已兴起的广场舞，却一直到 2013 年才得到“火热”般的关注。其间，广场舞大妈迅速从“全民健身”的时代标杆变成制造噪音的“全民公敌”。

“广场舞引起广泛关注，与‘大妈’的迅速标签化不无关系。”黄勇军告诉记者。

2013 年 4 月，国际金价暴跌，媒体把参与抢购黄金的中国女性群体形容为抗衡金融大鳄的强大力量，并觉得这个群体的行事风格、思维逻辑不可理解，“中国大妈”一词随之诞生，并且不断出现在广场舞的相关话题中。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社会到底在反感什么？她们为什么被如此对待？

在黄、米的指导下，调研学生刘金对网上关于广场舞的话语作了文本分析。他发现，广场舞因为审美上的“农业重金属”和动作的整齐划一被年轻人嘲讽，更因为“空间占用”“噪音污染”被讨伐。

对此，米莉给了一个有趣的视角：用“随身听”可以很容易地划分人群。当代城市青年，必然是戴着耳机，沉醉在他们藏于耳朵里的世界。把中老年人，即使不是也在跳广场舞，他们也不戴耳机，而是把可扩音的电子设备拿于手上或置于车筐，老歌、戏曲的声响跟随着他们在空气中散播。

“原本是两代人生活方式的不同，如今成了‘文明’和‘落后’的对抗。”米莉解释道。在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王芊霓看来，在现代城市中，公共空间的安静有序已成为主流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伴着激情舞曲在广场扭动起舞的大妈们无疑是聒噪的，牢牢掌握话语权的都市主流，毫无悬念地碾碎了大妈们微弱的声音。然而，当曹露、余珊珊、杨卓为这些 90 后调研学生，在与身边的年轻人一个个闲聊时，却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毫不掩饰对广场舞的厌弃，觉得低俗可笑，却愿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广场上消耗多余的精力，“动身体好”“省得一个人闷”“不会老来烦我了”。

“除文明的定义外，还有城市设计人性化的问题。”米莉举出例子，“我们很少注意的是，女人有百货大楼有美容院，中产阶层有茶楼有各类健身馆，年轻人有 KTV 有咖啡厅。可中老年人呢？除了公园、小区的空地，还有哪属于他们？”

王芊霓认为不能忽视的是在当代中国城市，特大型超市以及私人房地产的扩张正在挤压公共空间。“我们这个几百亩的小区，就一小块空地，怎么可能不冲突？”

不过，当用城市和农村对广场舞进行区别时，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城市广场舞因为“空间占用”“噪音污染”被讨伐，而农村广场舞反倒日渐被视为乡土文明重构的手段。

“这很容易解释，农村空地多，哪儿都能找一块。再说，年轻人都往城市跑，农村的安静与否跟他们无关。”生于陕西农村的米莉说。

广场舞群体中不仅有大妈

黄勇军开始这项田野调查时，这场参与者多达 1 亿的广场舞运动，在学术上仍是一个研究盲点。“这个研究，只是个破冰而已。”黄勇军告诉记者，他更希望看到在热衷报道广场舞新闻、热衷吐槽“大妈”之外，有更多的人愿意把广场舞舞者看作具体的人，去打量，去感知。

文化学者黄纪苏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王芊霓同样把目光投向了这个特殊的群体。与黄勇军不同的是，除了大妈们，这两人也在关注那些不断出现在广场上的大爷，还有银行管理人、政府公务员、老师……

有着 3 年舞龄的黄纪苏在北京王府井的广场上，以广场舞参与者和文化学者的双重身份，观察感知这些在身边扭动起舞的舞友。在他的描述中，那些发生在广场、公园和马路边上的舞蹈，是继友谊舞后，身体与舞蹈关系史上的一场继续革命。

在他看来，舞蹈回归民众身体的说法尤其适用于男性。这两年，他发现身边跳舞的男性越来越多了，原因多样，也总离不开“健康”“认识人”“说说话”等。

北京王府井的广场上，黄纪苏随着音乐，跟一群搞物业的、卖菜的、退休的老师们在跺脚抖腿地跳着。在河南某市，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王芊霓也在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强调参加广场舞的人是多样的。“与其说是集体主义的回潮，不如说他们在追求美、健康和社交。”

在黄勇军眼中，大爷、公务员、教授也跳广场舞，这有舞蹈回归身体的一面，而更多的是源于这代人的独特成长经历：这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知识结构无从谈起，审美趣味和精神生活乏善可陈，“就像一个暴发户，从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他再有钱买最好的咖啡，也只是随大流喝而已”。

“社会转型带来了冲击与阵痛，他们是在巨大失落中自救，广场舞是他们无可奈何下的刚需。”在黄勇军眼中，他们从集体主义时代而来，或多或少被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在广场舞的“类集体”中寻找归属感。

与黄勇军的伤感相比，还在跳广场舞的黄纪苏则显得乐观，他不赞同用集体主义烙印来解释广场舞，更倾向于将“每天1小时像礼花一跃而起地跳舞”，看成是民众在“自发地重建社会、重建意义”。

“经济跑得四蹄生风，社会疼得满地打滚，这是当下的社会。”他说，近30年来，市场经济快速膨胀为市场社会，财富价值观对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进行了疯狂扫荡，垣残壁颓，尸骨枕藉。

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广场、空地、公园、街边上的广场舞出现了，“民众在不断开拓的社会空间里行动起来，拯救自己的人生、人际与人心。”他还记得有个大姐跟他说：“咱挣得少，可活得好。”

3年前，这些参与调查的学生，曾在课堂上为广场舞这个议题争得面红耳赤，如今谈到广场上大妈大爷的起舞扭动，再没有当日的激愤。“是一个值得尊重，同情和理解的群体。”90后男孩杨卓为在调研报告中写道。

（文中广场舞者何湘玲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